

書評

翟學偉, 《中國人的臉面觀》
(台北: 桂冠圖書公司, 1995), 400頁。

徐冰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翟學偉先生的《中國人的臉面觀》是第一本探討中國人特有的心理與行為“臉面”的學術專著,也是社會心理學本土化探索研究的一個出色的實例。翟學偉的研究旨趣在於,尋找臉面心理及行為與中國社會文化的內在邏輯關係。在臉面的研究中,翟學偉面臨着一個困境,就是很難在實證和非實證方法之間做取捨,他試圖以一種描述-情境-詮釋的方法避開這一困境。一方面,翟學偉承認,實驗和問卷這兩種實證方法是心理學和社會學取得科學地位的支柱。為使其研究具有科學性,翟學偉在書中建構數套概念及理論模式,體現出實證構思(construct)的努力,因而楊國樞先生稱讚這些架構或模式具有高度的可驗證性(testability),並鼓勵翟學偉本人或其他學者參考它們,繼續做實證主義方法取向的研究。另一方面,翟學偉深感這兩種實證方法中存在的問題,已經不是技術所能解決的,深切懷疑它們對中國人研究的可靠性。那麼,翟學偉可能實現楊國樞先生的期望,將其研究實證化嗎?本文將結合翟學偉所關注的實質問題的核心,和他的研究旨趣,來討論這一問題。在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中,實驗法和問卷法的實證思想是統一的,其中實驗法更具代表性。因而在本文的討論中,將這兩種方法結合在一起分析,按照實驗法的習慣,將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稱為主試和被試。



翟學偉的臉面定義是：“臉是個體爲了某一社會認同的形象而表現出的規格性心理與行爲，而面子是這一行爲在他人心目中產生的序列地位，也就是心理地位(以此區分於社會地位)”(64)。臉和面子是一個連續體，但由於中國社會特有的“關係”這一變項的介入，臉和面子有時統一，有時分離。這裏，翟學偉給出貫穿全書的兩個核心概念，規格性行爲和心理地位。那麼，能否以這兩個概念爲基礎，進行實證研究呢？

翟學偉用規格性行爲來定義臉，使臉成爲一種可觀測的行爲，是符合實證思想的。然而，翟學偉更大的目的，是用規格性行爲來揭示臉的文化心理內涵，來說明臉不能歸結爲道德品質。他說，規格性行爲是透過印象整飾和角色扮演，即透過裝束、言行、舉止來達到特定的形象。其整飾的手段可以是表裏一致的，或有德性的，也可以是表裏不一致的，或虛偽的。所以，只能說它是要達到自己印象整飾的目的，或工具性的目的，而不能說它是要達到社會規範的要求(91)。因此，胡先縉將臉歸結於道德品質，哥夫曼(Erving Goffman)只看到面子的正面價值，都是片面的。翟學偉在“臉面的內核”一章闡明，中國人的臉面觀在價值上是儒家倫理思想對人的一系列規定，也就是一整套的規格行爲。臉面的內核是仁和實現仁的禮。仁的內在基礎是人的天性之情，情爲田，禮爲耕。所以，規格性行爲就是禮。可是，爲甚麼規格性行爲又可能是不道德的呢？翟學偉在“臉面的功能”一篇分析到，因爲禮的虛化，臉的規範成爲“虛禮”，這時做出規格性行爲的臉的內在動機很可能是不仁的。所以，臉不只在道德的範圍之內。可見，翟學偉使用了一個行爲概念，關注的卻是行爲背後的動機，而且是具有社會文化意義的動機。一句話，他想尋找臉面心理及行爲與中國社會文化的內在邏輯關係。

翟學偉的分析不乏精到之處，他將其分析概括爲366頁的圖尾-2，“中國人的臉面觀”。該圖分別以有臉(價值取向)和有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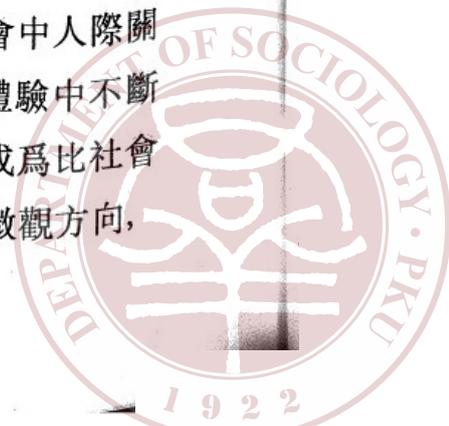
子(現實取向)為縱、橫坐標。可是，在這個圖中，筆者看不出臉與道德的分別，就是說，筆者對規格性行為這個概念的理解不同於翟學偉。中國傳統思想中有孟子的性善說，也有荀子的性惡說。作為人天性的情緒，並不必然能使人成仁，還需要禮從外面化性起偽。所以，當人們內心不情願卻仍按照禮的規格去做時，雖然表裏不一，但仍是道德的實踐。人們正是在道德實踐過程中向着“從心所欲不踰矩”的內外統一的圓滿方向發展。圓滿是一種理想，在現實中無法實現。然而，不能實現圓滿的行為，仍然可以是道德行為，只要它守禮。陽奉陰違與拿捏分寸，是中國傳統社會中人們默會之知(tacit knowledge)的交往之道，不這樣做反而會被指責為不“通情達理”。¹ 正如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談到禮治社會的規範時所說的，不這樣做就“不合、不成”。“不合、不成”一起說，表明中國傳統社會中的道德既是價值性的，也是工具性的，二者之間無法區分。陽奉陰違雖然違背了內外統一的價值觀，卻符合不爭和無辨的追求和諧的情理。在這種理解基礎上，規格性行為就是道德行為，規格就是社會規範。否則，規格與不規格的區別是甚麼？評判禮的虛與實，已經超越的實證思想的範疇，而進入了批判的範疇。

不能說筆者的理解比翟學偉的詮釋更正確，問題在於，我們能否用一個簡明的、行為式的概念來揭示文化心理內涵而不產生歧義。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理念與習俗觀念是依情理思維建構起來的。情理思維是一種情不離理、理不離情的思維，其旨趣是追求和諧的、融合的體驗，或“樂”，在“樂”中消除各種對待或對立。² 孟、墨的差序與兼愛之辨，莊、惠的魚樂知否之爭，都是情理思維與邏輯思維的對話。孟、莊之為中國人所接受，乃在於情理思維與傳統中國人在其主要生活領域“家”中的體驗相契合。依據情理思維建立的每一個概念，都無法邏輯地說清，建構的觀念系統，也不是諸概念的邏輯關係結構。概念之間相互證成，每



個概念都只能在體會中把握。如，甚麼是仁，甚麼是禮，都沒有邏輯清晰的定義，卻有禮為實現仁和仁就是克己復禮的相互證成。情理思維追求內與外，工具與價值等在邏輯上的諸多對立的和諧統一。但這種統一在現實中無法充分實現，怎樣做才對，要靠每個人在具體的體驗中去“權”。翟學偉所說的中國人的臉面心理的“體驗-情境”特點就把握住了情理思維的關鍵。因此，中國人會根據自己在具體情境的情理體驗，對同一個概念，如甚麼是道德、甚麼是規格性行爲，有相當不同的詮釋。因此，我們不能對具有深厚情理意的概念做出簡明的邏輯解釋，並以之作爲實證研究的基礎概念。以一個被研究者可能對其有不同理解的概念作爲實證研究的基礎概念，可能會導致研究結論不能真正解釋被研究者的心理的結果，因而使實證研究的效度很低。楊中芳曾批評用一個簡單的“集體主義”概念來研究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爲。³同樣，翟學偉不能用規格性行爲作爲基礎概念進行實證研究，去實現他“揭示中國人心理與行爲與中國社會文化的內在邏輯關係”的目的。

在翟學偉的討論中，臉側重形象和印象，因而重點落在個人的榮辱上，更靠近自我和人格；而面子偏重交往過程中的重視程度上，重點落在人們的關係上。那麼，能否找到具備涂爾干(Emile Durkheim)的社會事實的條件的、普遍而客觀的關係，來對面子做實證研究呢？翟學偉用心理地位這一核心概念否定了這一可能性。他舉例說，如對甲來說乙的社會地位比丙高，但丙是甲的親屬、朋友或老相識，那麼丙在甲的心目中的地位就可能比乙高，儘管社會地位丙比不上乙，但甲給丙面子，不給乙面子。即，社會地位和面子不是正函數關係。翟學偉指出了中國社會中人際關係的主要特點，其中有“情”在內(92)。人們在情理體驗中不斷建立着不斷變化的遠近親疏的關係，而這種關係可能成爲比社會地位更重的面子砝碼。所以，臉面的研究，既不能向微觀方向，



研究脫離社會文化心理意義的可控制的行爲，也不能向宏觀方向，研究超越個人情理體驗的普遍而客觀的關係結構，而只能在人與人之間互爲主體的(intersubjective)情境之中，在個人的情理體驗中研究臉面。而這種情境不同於波普爾(Karl Popper)的境況邏輯(situational logic)方法中的境況。

波普爾倡導的境況邏輯方法，是一種將內在的、主觀的精神狀態外化爲客觀的、可檢驗的因素的方法，如他自己所說，境況邏輯“不是一種心理學的方法，而是一種邏輯的方法”，它的前提假設是個人依理性而行動。⁴ 這種境況假設，任何人對假設的境況和對真實的境況一樣做出理性的反應。人的主體作用被簡化爲綜合考慮與權衡他所面臨的因素，然後採取理性的行動，亦即，人的精神狀態可以淡化出境況。而翟學偉所說的情境，是個人依情理而行動的情境，這種情境的突出特點就是其中的“情”，或精神狀態。這種情的體驗是不可假設的。翟學偉舉一個關於對中國首次“油畫人體藝術大展”的態度調查來說明這個問題。對五百一十九份問卷的統計處理顯示，認爲人體模特工作崇高，應受尊敬的佔78%，認爲她們厚臉皮、見不得人的佔2.3%，其他的佔19.6%。而兩名女模特本人卻不斷受辱，其中一名丈夫已經提出離婚。爲甚麼受到人們普遍尊敬的模特卻受辱和沒臉面呢？翟學偉指出，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臉面是一種“體驗-情境”的心理與行爲，沒有親身體驗者，無法在問卷中反應這種心理。如果那78%在問卷回答中表示尊敬模特的人做了模特，也會體驗到耻辱和沒臉面。

上述調查結果失真的另一個原因，是關於“社會讚許”法則的問題。楊中芳指出，中國被試很容易遵守“社會讚許”法則，盡量說些客套的，不傷害不得罪人的話，在回答問題時以不損害自己的面子，以不傷害主試人面子爲反應基準。⁵ 對此，翟學偉說到，如果我們爲研究中國人的面子而找中國人做被試，結果被試



因為顧全面子反而讓我們無法研究出面子，這真是一件滑稽的事(58)。

從以上圍繞翟學偉貫穿全書的兩個核心概念，規格性行為和心理地位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以翟學偉關注的實質問題和其研究旨趣，他無法實現楊國樞先生的期望，以實證研究來驗證他的詮釋。由此引發我們思考更深刻的問題是，在社會心理學本土化研究中，實證方法的可行性問題。

首先，社會心理學研究所建構的知識屬於美國分析哲學家戴維遜 (Donald Davidson) 所說的互為主觀的知識 (intersubjective knowledge)，其中涉及對心理事件的理解 (understanding) 與詮釋 (interpretation)。由於心理事件無法還原為物理事實，因而用從研究物理事件發展出的實證方法勢必產生困境。⁶ 阿朗遜 (Elliot Aronson) 指出，社會心理學實驗所固有的問題是，要在心理影響 (impact) 和控制 (control) 之間做取捨。⁷ 由於研究者們為追求科學性的控制而只能捨棄心理意義，因此實驗的境況與日常生活中的社會境況差別太大，研究缺乏外部效度 (external validity)。⁸ 並且，實證方法體現西方理性的思維，以理性思維傾向的方法研究情理思維傾向的中國人，存在着楊國樞先生所說的“本土契合性”的問題。翟學偉的困境便是突出的例子。楊中芳還專門討論了諸多西方經典社會心理學實驗在中國重做的問題。⁹ 楊國樞先生提出“本土契合性”的概念，作為判斷研究本土化程度的標準。他指出，只有當研究者所研究的問題、所建構的理論、所採用的方法，能夠高度適合當地民衆之心理與行為時，才能做到“本土契合性”。並且，研究中所涉及的經濟/社會/文化/歷史脈絡因素越多，研究活動或成果便越具有“本土契合性”。¹⁰ 社會心理學的實證研究本身便難以納入很多有意義的脈絡因素，加之其理性思維傾向與中國人的情理思維傾向從根本上不相契合，所以，筆者認為，實證方法不能適合於社會心理學的本土化研究。



注釋

- 1 詳見鄒川雄,〈拿捏分寸與陽奉陰違——一個中國社會行事邏輯的初步探索〉(博士論文,台灣大學,1995)。
- 2 詳見筆者的〈情理與審查——中國傳統思維方式之社會心理學闡釋〉,將載於《社會學研究》。
- 3 詳見楊中芳,〈試圖澄清有關中國社會心理學本土化的幾個誤解〉,《社會學研究》1991,第一期,32-38;和楊中芳,〈中國人真是具有“集體主義”傾向嗎?〉,載於《中國人的價值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漢學研究中心,1992)。
- 4 關於波普爾的“境況邏輯”方法及其與理解和實證的方法之間的關係,詳見秦方明,〈社會學方法論新探〉,《社會學研究》1998,第三期,35-47。
- 5 詳見楊中芳,〈試談中國實驗心理學的本土化〉,《廣州師院學報》1989,第二期,18-31。
- 6 見翁正石,〈當奴·戴維遜的社會科學觀〉,《社會理論學報》第一卷第一期(1998),163-189。
- 7 Elliot Aronson et al., *Methods of Research in Social Psychology*, 2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90).
- 8 Leonard Bekowitz and Edward Donnerstein, “External Validity Is More Than Skin Deep,” *American Psychologist* 37 (1982), 245-257.
- 9 詳見楊中芳,〈試談中國實驗社會心理學研究的本土化:對以“集體主義”為前提的實驗研究的反省〉,載於《如何研究中國人》(台北:桂冠,1996)。
- 10 詳見楊國樞,〈我們為甚麼要建立中國人的本土心理學?〉,《本土心理學研究》第一期(1993),6-88;和楊國樞於1997年香港第二屆華人心理學家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的論文,〈心理學研究的本土契合性及其相關問題〉。

